

我的青年時代

(上)

● 王元輝 原著 · 吳端容 校訂

焚香點燭叩頭拜師

民國前十二年（公元一九〇〇年清光緒二十六年庚子）四月我出生在四川省灌縣的蒲村。民前九年正月，我的祖母逝世於彭縣青杠林的老家。我同媽媽坐轎子回去奔喪，在轎子裡弄翻烘籠（內裝木炭生火用以取暖），一場驚駭。那是我最早的記憶。從青杠林回蒲村以後，媽媽帶我和七歲的姐姐去王老師的家裡上學。焚香點燭，向那頭上戴着「紅結瓜皮帽」的王老師叩頭、拜師，這件事我記得更清楚。

爸爸做生意，時常出門，家裡的大小事務全由媽媽掌管。媽媽個性極強，思想特異。她自己是纏腳的，卻不要她的女兒纏腳，她自己不識字，卻主張她的兒女都要讀書。那時，我們家附近沒有教書先生，所以她把我和姐姐送到花子街（興隆街）王道鰲先生家裡的私塾去上學。她每天給我們送午飯，無間寒暑陰晴。若傍晚放學時有雨，她還要給我們送斗笠來。因為來去都要經過一段河

邊路，媽媽經常為我們提心吊膽。鄰居們對於媽媽的特立獨行每多批評，但絲毫不能改變她「我行我素」的決心。

我在王老師那兒兩年，讀了很多書：三字經、百家姓、孝經、大學、中庸、學而、先進、上孟、下孟、離婁、告子；好像這些是正規的書，此外還讀過龍文鞭影、幼學、千字文、七字鑑，增廣等等雜書，有些連書名都記不起了。記得雜書中有一本「日用時行雜字」，前半本字較大，頭四句是「蒙童性易驕，家長把心操；樹小盤時易，枝大曲則勞」；後半本字較小，頭兩句是「油塩柴米醬醋茶，收拾齊備好當家」。王老師教書的方法是教一句，我跟着唸一句。教過之後就自己讀，讀熟以後就「背」。唸完一本之後要整本全背，名之曰「包本」。包本以後再唸新書。舊書也要抽背，有時候一次抽背好幾本。

官學堂變成了私塾

民前七年，蒲村開辦了「官學堂」。地

點在上陽街文昌宮，離我們家不遠，來去都不經過河邊，比較安全，可以回家吃飯，不必送午餐，而且不收學費。起初媽媽說那是洋人辦的，她很懷疑，隨後打聽清楚說是官辦的，她才到王老師那兒去致了謝意和歉意，以後，才把我送進官學堂。她惟一不滿意的是官學堂不收女生，姐姐此後便未上學。

官學堂威風凜凜，門前吊一個長牌子，上書「官立蒲陽場初等小學堂」。高高掛着兩面虎頭牌，「學堂重地」、「閑人免進」。官學堂的章法和私塾迥然不同。每天上課八小時，午飯回家吃。星期日放假，過年放寒假，熱天放暑假。有三位老師上課。國文教「人手足刀尺山水田」等等。算學教加減乘除，還有格致、地理等，都容易聽懂。又有體操和唱歌，很好玩。同學有六七十個人，一齊擠在一個講堂（文昌宮的大殿）裡上課。同學中最大的有三十幾歲。我是最小的，才五歲。年終考試後發榜，我是第一名。這是因為我人小，老師把座位給我排在最前頭，所以老師講的我都容易聽懂。有一些坐

得遠的同學不容易聽懂。

這樣的官學堂只辦了一年就走樣了。民前六年，聽說因為經費不夠，那三位年輕的老師都不來了。新來任教的只有一位曹老師。曹老師原來是教私塾的老師，因為他管教學生很嚴，愛打人，故有「曹打鐵」的綽號。他二臉的大麻子，實在是有威可畏。官學堂又變成了私塾，只是不收學費而已。每天從早到晚唸書，只有放學回家吃午飯，稍得休息。沒有星期和暑假，只有過年放年假約二十天。同學只有二十幾個人，程度參差不一。我唸過四書，所以從詩經唸起。一般的同學都是唸到能夠背誦為止，只有四五個年齡較大的同學已經「開講」了。有一天，我也去非正式的參加聽講，我居然聽懂了老師在講論語上「長沮桀、溺耦而耕」的那一段故事。這使我高興異常，我發現了書中的趣味。老師已察覺到我在注意聽。講完以後，他問我：「你懂嗎？」我點頭。他考問我：「長沮是甚麼？」我說：「是一個名叫沮的高長子」。又問：「桀溺呢？」我答：「是一個胖子名叫溺」。從此以後，老師要我正式參加聽講。曹老師教了我們三年，除了頑皮的同學怕他打人而外，認真唸書的還是很喜歡他。到了民前三年的秋天，曹老師忽然大發脾氣，說他不幹了。聽說他的薪水是由幾家賣豬肉的屠戶攤派，而且要他親自前去收討。他認為這是「有辱斯文」，所以他「不幹了」。

曹老師去後，文昌宮的學堂，越來越不像樣。老師時常換，同學一天比一天少。宣統三年春天，來了一位徐老師，傳說他曾在街頭算命，家長們都瞧不起他。其實，他是一位熱心而多才多藝的老師。他喜歡教我的算術，而且他借給我四本算學書，內容豐富，有「雞兔同籠」一類的難題。

宣統三年秋天，四川保路同志會興起，蒲村陷入兵慌馬亂的景象中，人心惶惶，文昌宮的學堂就無形停頓了。同時，哥老會的袍哥們公開活動，開山集會，吸引新弟兄，無書可唸的大孩子們多半都當了袍哥。我對媽媽說：「我已當了袍哥，甲廷大爺是我的拜兄」。這句話卻大大地惹怒了媽媽。她說：「你簡直沒老沒少，甲廷大爺已經五六十年，你敢稱他拜兄？」於是，她趁着爸爸從山頂上回家來的時候，她便和他商定，把我帶上山裡去。

在山林中作工讀生

爸爸已經在山中從事伐木業有年，從前似乎相當興盛，到宣統年間頗有虧損，所以我們的家境日見蕭條。他經常在山中工作，每月回家兩三次。宣統三年的秋天，他正在離蒲村約二十里的王家山主持一個規模很小的「棚子」。媽媽和爸爸商定要把我帶上山中去就是帶往王家山。

我們動身上山之時，媽媽似乎很難過。我說要帶一些書去。媽媽說：「山上沒有學

堂啊」。爸爸同意我帶書，但要我自己措。我選了四書、詩經、左傳和一些故事書加上徐老師借給我的數學書裝進一個書包，自己措上。雖然是初次走山路，我並不覺得辛苦，只是穿草鞋有些不習慣而已。

上路以後，爸爸指着相當遠的一個山缺口告訴我：「那是一個『垭口』。我們要慢慢地一步一步地爬上那兒。王家山在山的「一面」。他說我走得很快，不能持久，必須上山如『拉繆』（船伏拉上水船），下山如『鷓箭』這一帶的山，我本來看得很熟，但是在遠處看它好像太平淡簡單而呆板；上山來，才覺得它深邃複雜，而變化萬端。所有的樹林、岩石、溪流、房舍，都使我感到真切而美麗，走得越高、看得越遠。路轉峯迴，變化莫測，對於山，我有了進一步的了解。翻過垭口，眼界更開。天更高，山更遠。迎面一座深藍色的高山之下，有一條碧綠的河，爸爸說，那是白沙河的上流，離灌縣城不遠。

王家山的「瓦房老爺」，我只知道他姓王，不知道他的名字。因為他的輩分高，所以他雖然只比爸爸大幾歲，我也稱他爺爺，稱他的太太為奶奶。他們的小女兒比我大了多少，我也要稱孃孃。整個王家山的地主都是王家人。爸爸買了瓦房老爺一段杉林，從事砍伐，棚子就設在瓦房內。棚子是伐木工人食宿的地方，本來應該搭建在林場之內，但是爸爸因為缺少資本，只能雇用三五位

工人，至多七八位，而且所雇工人大半是附近居住的人，晚飯後就要回家的，所以他商借了瓦房的一間大屋子作為棚子。我本來也住在棚子裡，後來瓦房老爺讓一間小屋子給我住，因為要那間屋子才能擺一張小棹子使我能夠看書，瓦房老爺和伐木工人對於我都很敬重，因為他們說我是讀完四書五經的讀書人，他們很少見。

爸爸派定我每天要做的工作是取水、搬柴、找野菜（如野油菜及蕨苔等等），及我可能做得下的幫忙工作。我每天都有時間自由活動：遊山、看水、採果子、找鳥巢等等。也能抽空看書。晚飯後，工人們往往要求我講故事。間或爸爸派我到蒲村或灌縣城去採買東西，都是當日往返。灌縣城沒住處，當然是當日要返回，在蒲村，則是因為媽媽不准我在家裡逗留，所以也要當日返回。

有一次，在蒲村耽延太久，起身回山的時候，已經迫近黃昏，我初次嘗試獨自一人走夜路的味道。我正在一個「哨台」上歇氣，忽然發現我面前坎下有一個圓圈。在濛濛月光下，看得出圈內有一件微微發亮的東西，好像繫有一根紅色布條。我忽然聯想到戲台上的弔頸鬼，不是繫有一根紅色布條做舌頭嗎？我尖叫一聲，拔腿便走，殊不知那圓圈也應聲而倒，滾下坎去，發出喊叫之聲和鏗鏘之聲。許多天後才查問清楚。那是一位端公（巫師）。當時他正走向那附近的一戶人家去收鬼治病。他揹了一個背兜，裡面裝

有一副銅鉢（響器），上面繫有紅色布條。他在我面前坎下一個哨台上歇氣。那是兩條平行的路，一高一低，恰好高路和低路都有一個哨台，我在高路，他在低路。他的到來，我沒有察覺。他也不知道我在他的後面。所以，他嚇得我一聲尖叫。他也被我那一聲尖叫嚇倒，滾下坎去，幸而沒有受傷。

又有一次，也是因為在蒲村起身太遲，我妙想天開，打從萬丈溝的「毛路」，筆直地爬上垭口，希望省些路程。那是一條打柴的人所走的路，我沒有走過。越走越模糊，越走越荒。月夜裡在荒林中望着垭口上的兩株大樹（人稱望山）急竄。一面走一面大聲喊叫，希望老虎、豹子讓路。

成了父親得力助手

從王家山到灌縣城買東西，也不能掉以輕心。有一次，我仗着有大月亮的天氣，已入黃昏，我才從灌縣城起身。從灌縣到王家山雖然只有十幾里路，但是一出北門左走就是墳場，幾百年來重重疊疊亂葬的墳場。到王家山的路，必須打從墳場經過，大約有五六里。我還沒有走過墳場的一半，天就黑了。

在夜間，鼻子和耳朵分外靈敏。死屍的臭味特別濃。蟲聲特別刺耳。任何一點意外的聲響，都會使人冒出一身冷汗。經過黑靈靈的一座「官房」（縣官在清明節來祭孤魂野鬼的地方），只好閉着眼睛瞎竄。不僅此也，還要過一個名叫「老母孔」的一個岩洞，

聽說爸爸曾在那兒遇見過熊。再上坡過「黃炭樑子」，不久以前，曾經有老虎在那兒吃掉一個孩子。

經過若干次的「嚇鍊」，我對於走夜路有了一些經驗，而且漸漸感到興趣。王家山的野豬很多，糧食在接近收穫期間，常常被它們夜裡來偷吃，人們便敲着梆梆去把它們趕走。我也喜歡參加它們趕野豬的活動。野豬也是兇猛野獸，它們為了保護自己的兒女，常與老虎豹子拼鬥而得到勝利，但是一聽到梆梆聲，就拼命逃竄，也許它們已經懂得梆梆聲的後面可能跟得有要命的槍聲啊。

在三、五歲的時候，我的眼睛似乎有病。怕見太陽，遠一點的東西，不甚看得清楚，晚上在菜油燈下看書，尤為吃力。直到七、八歲以後，都還不見得十分好。上山以後，不知不覺地經常抬起頭來看太陽，遠的東西也漸漸看得清楚了。王家山對面遠遠的一座大山，在雨過天青之際，冒出一簇一簇的白雲，雲形變化莫測。我很喜歡凝視那樣的景緻，我希望在雲裡發現神仙。在夜裡趕野豬，我也喜歡凝視那月光下一垛一垛的，悠閒遊蕩的雲。假如神仙真能騰雲駕霧，他們所騰的雲應該就是那一種雲。

王家山伐木工作結束以後，爸爸又在二峨眉山上買了一個林場，他也帶我前往。那裡距蒲村更遠，不容易當日來回，我就難有回家的機會了。爸爸的經營似乎越來越不順意，所以在二峨眉用人更少，我便成為他的

得力助手。好像是我在王家山已經住了一年，到二峨眉又住半年多，已到民國二年的六月。有一天，我忽然想起媽媽的生日是六月二十二。我要求回家給媽媽做生日，爸爸准許了我。

媽媽看見我突然回家，十分詫異。我說是為她做生日，她心裡還是很喜歡。二十三日，媽媽的生日已過，她便催我回到山上去。因為二十四日是灌縣城二王廟的神會，我要求到灌城（離蒲村只十八里）看了神會再上山。媽媽很信神，所以她准了我。

六月二十四日，看了神會以後，在回家途中遇見四個從前的同學。我向他們打招呼，他們不理。其中有一個好事之徒，說我不該叫他們的名字，向我挑釁，立刻就打起架來，我奮力拼鬥他們四個人的圍攻。這時候，忽然有一位大人（成年人）來到，喝散了他們。那位先生是蒲村中正街李大爺布店裡的管帳先生，他認識我。他同我走另一條路回蒲村。我滿腔憤怒，那位先生在路上和我說些甚麼，我全未聽見。回家見到媽媽，她立刻判斷我曾經打架。她問我受傷沒有，我搖頭否認受傷。媽媽問我的一切，我都不答覆。我不吃飯就去睡了。第二天早上，趁着媽媽不注意的時候，我便穿好衣服走出門去。我到文昌宮的學堂裡去了。

堅持復學考上高小

我到文昌宮一看，弔牌上的初等小學堂

已經改為「初等小學校」，兩面虎頭牌已取消。住持尹道士還認得我，他介紹我去見當時的王厚村老師。我請求回學校唸書，王老師異常歡迎。

我回家告訴媽媽，我已請准回學校唸書。媽媽十分詫異。她說：「家境越來越窮，爸爸已五十幾歲，你那裡還能去唸書？」我覺得爸爸身體還很康健，家境如何，不應該由我考慮，無論媽媽怎麼說，我只是堅持非去唸書不可。其實，媽媽是本來主張我應該唸書的，只因後來看見我有流蕩的危險，所以才把我趕上山去；而今看見我堅決要唸書，她當然要加以考慮。到晚上，她有條件地准許了我。第一要幫助做家事。第二不能亂用錢。第三，尤其不能去和袍哥們廝混。我懇求只要媽媽准許我唸書，她所提條件，我件件依從。

我為甚麼要堅持一定回去唸書呢？其目的只是想報仇。我想回到學校，把從前的朋友們團結起來，才好懲罰那四個在路上圍攻我的傢伙。但是，回到學校一看，大失所望！不但那四個傢伙都不在學校，其他的朋友也一個都沒有了。

蒲村已有了三個學校。除王先生任教的文昌宮之外，還有馬之良先生任教的紫雲宮，與乎白耀珊先生任教的真武宮。每個學校都有三四十個學生。每個學校都有其特色。馬之良先生最年輕，幹勁十足，儼然是三個學校的領導人物。白耀珊先生老氣橫秋，經

常誇耀他有一個學生郭象安在保定軍官學校唸書。王厚村先生平平穩穩，專心任教，不甚與人爭長論短。紫雲宮最優秀的學生是任覺五和唐應璧。任覺五後來曾留學日本，當過四川省教育廳長，是政壇風雲人物。真武宮則是廖承金第一。孟昌齡第二。王厚村先生有一個兒子王天長，比我大兩歲，在學校中儼然是王先生的助教。但是，他的成績不算頂好。有些同學已開始學做文章，讀的是東萊博議及古文觀止一類的書。每三四個月，三個學校要舉行一次會考，考作文算術。而且有一次會操。會操時要唱歌，唱的是「樂莫樂兮從軍，貴莫貴兮軍人，金刀大馬是平生，快哉此行……」一類的軍歌。我第一次參加會考，作文不及格，算術一百分。第二三次會考都名列前茅，王先生十分高興。

王先生住家在灌城西邊六十里的渡口場，來往都必須經過灌縣城。如果他打聽到城裡有初級的「觀摩會考」他一定會帶我去參加。每次我都得到獎品。民國三年的暑期，王先生帶我到灌縣城北街高等小學去參加一個考試，任覺五等也在那裡參加。我覺得我那一次考得很不錯。我以為那考試也是觀摩會，當然也會有獎品。但是兩個月後杳無消息。那時我還是在文昌宮唸書。久不見任覺五，我去他家一問。才知道他已考進高等小學唸書去了！才恍然大悟，那一次的考試是高等小學的入學考試。我立刻到灌城去看個明白。學校的照牆上還張貼着本學期招生的

榜示。我赫然名列第四！我走進學校去，「稽查」先生問我何事，我說「想來唸書」。他說「已開學兩個月，不能來了。」我不理他的攔阻一直向裡面衝。遇見一位戴眼鏡的先生，我在那次考試的時候看見過他。我問「我還能入校否？」他考問我一番以後，說「可以」。他是校長陳夢龍先生。

媽媽聽說我考上了高等小學，甚為高興。她說，無論家裡窮到甚麼地步，都要支持我去唸書。

碰上亂子有口難辯

這學期，高等小學有四、五、六、七四個班次，蒲村來的任覺五、廣承金、孟昌齡和我都在第七班。我第一次上課是聽謝唐先生講地理。已講到東三省。我聽到的第一句是「遼河有二源，東北源曰東遼河，源出內蒙古肯特山」。謝先生的聲音洪亮，語調很好聽，每一個字音都異常清楚。這一天下午的第一堂課是金宗藩先生教唱歌。金先生在黑板上寫下歌詞，「雲霞燦爛如堆錦，桃李兼紅杏……」。隨着便教唱。金先生腳下發出嗚嗚之聲（風琴，我沒見過）。我發現其他同學有抄本，上面寫着一串一串的阿拉伯數目字（簡譜）。金先生看見我東張西望，他認為我不專心聽教，他考我一考，叫我「唱」，我並不推辭。我看那歌詞是七個字之後跟着五個字，和我聽過的小調「太陽出來一點紅，伊呀伊兒啲」差不多，我就照那

調兒唱起來了。金先生捧腹大笑。同學們都笑得東倒西歪，秩序大亂，金先生多方制壓，許久才把秩序恢復轉來。我雖然才進學校一天，班上的同學全都認識我了。

已經開學兩個月。我的中心問題是「要如何用功，才能把功課補得好，趕上其他同學？」國文、算術，我沒有多少問題。歷史、地理、格致修身都容易看懂。不久以後，我就完全趕上他們了。這一學期，我居然名列榜首。連着以後的第二三四五，五個學期，我都是第一名。

第三學期，謝唐先生的歷史講到班超投筆從戎。他講得眉飛色舞，我們深受感動。其時，北京政府正通令招考海軍，下課以後，我到教員休息室去問謝先生「我可不可以去投考海軍？」他十分贊成。同時，我們的國文教員李諫臣先生也在那裡，他卻十分反對。李先生正在教我們學做詩。第二天，李先生下課之時，在黑板上寫了一首詩。詠班超，「投筆從戎豈偶然，自古英雄必有真，若非虎頭兼燕頰，封侯夢老總難成」。恰巧下一堂就是謝唐先生的課。謝先生立刻把那首詩改成「投筆從戎亦偶然，畢竟英雄見本真，何必虎頭兼燕頰，封侯有志事當成」。後來因為媽媽絕對不准我去投考海軍，我只好作罷。

第六學期，快要畢業的那個學期，我碰上了一個大亂子。有一位姓周的同學在大眾打架的時候被打傷（輕傷而已），他指定是我

打傷他的，而且說我是蓄意打傷他。那時，我已是學校裡有名的搗亂份子，在「監學」先生面前，我有口難辯。有一位姓劉的教員，平時對於我頗有成見，他此時氣憤填膺地出面指控我，說我蓄意打傷同學，非把我開除不可。謝唐先生說：「不能開除。那有在第六學期開除學生的道理？」校長陳夢龍先生亦以為劉先生主張過火。他判定把我記兩個大過，再加兩個小過，留堂察看。這一學期的平均分數是九十五分，扣了八分，還有八十七分，我也得了第二名。第一名是任覺五。

發展個性放大眼光

民國六年夏天，我考入了五年制的，半官費的四川省立第一師範學校。校址在成都東馬棚街。校長李伯威先生是滿清時代的舉人，一位道貌岸岩的道學老夫子。學校的「中門」經常都是關着的，但校長出入的時候，門房必須為他敞開中門。校長要求學生要「坐如尸，立如齋」，走路要「行不由徑，周旋中規，直旋中矩」。

那些年代，成都的足球運動尚不盛行，但正在潛滋暗長中。第一師範校內無運動場，想不到居然有一位同學在教室附近玩足球，打破了玻璃窗子。第二天，校內出現一面長達好幾百字的牌告：「夫蹴球之戲，肇自軒轅，盛於唐代……」把古今蹴球之害描寫得淋漓盡致，歸結到「該生應負賠償玻璃窗

之責，并着記大過一次以儆效尤」。

體操教員黃純柔先生，有一次，兩天在教室裡教舞蹈。他指出我們班上那些人功課好，那些人功課差，猜中了百分之九十。他說「大學孔氏之遺書」不是「初學入德之門」。初學入德之門是「練身體」。要有「強健的身體」才有「敏活的腦筋」，「你們班上，功課比較好的都是身體比較強健的」。他雖然只教我們一個學期，他這一番話卻令人永誌不忘。

同住蒲村，高小同班同學的任覺五，這學期也考進了成都聯合中學。寒假到來，我們相約同路回家過年。出西門，我們遇見一位蒲村的熟人林先生，他問我：「你們的房子修好了沒有？」我愕然。他又說：「難道你還不知道府上失火嗎？」覺五卻毫不詫異。原來我家的房子確已被火燒掉！當時他正回家，親眼看見。因為我媽媽叮囑他千萬不要告訴我，所以他不曾對我講。

媽媽住在草草搭建的屋子裡，笑着看見我回家。她若無事地對我說：「你看，房子已經燒掉了。等你慢慢地找錢回來重修啊。」

過年以後，媽媽催我按時到成都上學。這是民國七年，成都又變了一個局面。

熊克武帶兵進成都做了督軍，楊庶堪當省長。

有一天，我在學校裡走路時擰着米突尺玩，被校長看見，把我訓誡一番。他說：「

你這樣輕佻，何以為人師表？」他教我不要和一位灌縣同鄉羅光海交往。他說：「四海之內皆兄弟也，何必同鄉？你看那羅光海穿一件淡藍色的飾布衫子，岔子開得那麼高。走路搖搖擺擺，飛揚浮躁得不成樣子」。我們都穿黑色制服，羅光海星期出街必換便衣，校長看他慣。我告訴了羅光海。他說，他已經知道他的危險，所以他打算參加勤工儉學，到法國去。

忽然聽說李校長有更換的消息，說是因為他和熊督軍與楊省長都沒有關係。不久，果然成爲事實。新校長是史學傳家的祝配懷先生。

民國七年秋季，我們的學校煥然一新。高等師範搬進了皇城，它原來在塩道街塩道衙門的校舍全部移交給我們。祝校長訓教學生要「發展個性，放大眼光」，而且他提倡體育。學校裡有一個不算大也不算小的運動場地。他曾經請兩個德國人來作網球示範，又曾請饒迺成先生來表演騎摩托車，使我們開開眼界。從前李校長禁止踢足球，但是我們還是偷偷地到少城公園去踢「圈子」，現在既然學校提倡體育，我們的「球會」便公開地轟轟烈烈地發展起來，經常和各學校的球隊互邀比賽。

我們第六班，雖然班次不高（第三學期而已）顯然是全校最突出的一班。球會以我們爲骨幹而且有好幾位出名的選手。我們有一個樂團。其實算不得一個「團」。校內「

大塢子」的一個角上，有一座小小的假山，山上有一座亭子。每天晚飯以後，自修時間以前，那亭子幾乎全部被我們班上的同學所佔領。他們都帶了自有的樂器，胡琴、月琴、笛子、洞簫、小鼓、小磬等等，由「天才音樂家」鍾炳驥同學略加安排指揮，各獻所長，居然能交響成章，且多創意，聞者欣然。

捲起被蓋走出校門

民國七年十一月，第一次大戰結束。八年春，各國在巴黎舉行和平會議。我們的代表在和會席上要求取消乘歐戰爆發之際，日本脅迫我們所訂的「二十一條」協定，各國代表說我們的政府曾於民國七年九月與日本所訂，「山東善後協定」，關於二十一條中有關山東部份，有「欣然同意」的明文，不得謂爲脅迫。此項協定是秘密的外交協定，我代表無所知，瞠目不能對，於是各國便武斷地要我們把德國在山東侵佔的權利讓與日本。消息傳到北京，舉國共憤。五月四日，北京各中等以上學生萬餘人舉行示威遊行，要求嚴懲主持簽訂喪權辱國條約的官員及拒簽和約。遊行群眾放火燒了前外交總長曹汝霖的房子，把當時駐日公使章宗祥（適在曹宅相遇）打個半死。政府派出軍警毆捕學生，於是演成罷課罷市要求釋放被捕學生的「五四運動」。

五四運動震動全國，四川也被波及，成

都中等以上學生組織外交後援會響應之。我們班上的同學參加外交後援會特別熱心，經常到街頭演講，力竭聲嘶地鼓吹「抵制日貨」。我們的國文教員唐鐵風先生曾經幾次聽到我們的演講，他對我們半開玩笑地說：「你們的演講煽動性太強。假如把群眾鼓動起來搗毀了『馬裕隆』洋貨店，你們會吃官司

的」。唐先生是成都國民公報主筆，他教我們的國文，頭一篇講義是「莊子逍遙遊」。他說，要把我們的文思引離古文觀止的範圍而導向諸子百家。——前些年在香港逝世的新亞書院院長唐君毅是鐵風先生的兒子。四川連年內戰，殺來殺去，迄無寧日。



右起：王元輝夫婦、孫女、大兒子王輝鄂在頤和園中的昆明湖畔留影。

民國九年七月，呂超反對熊克武而襲取成都。從前被熊克武逼退陝西的劉存厚舉兵回川，九月入據成都，稱靖川軍總司令。當時，四川人民對於任何軍隊都十分忿恨。劉存厚進成都不久，大約是十一月間，他的兵在少城公園與學生打架，學生多人受傷，激起人民公憤。學生代表數百人齊集北較場總司令部抗議，在寒風中站了一個通宵，毫無結果。「秀才遇到兵，有理說不清」也。

四川自從有所謂「防區制」以來，駐軍就地籌餉，國稅省稅提取一空，庶政經費甚為拮据，教育經費更難籌措。我們師範學校，原來是全公費，民國六年改為半公費。民國十年，又要改為全自費。同學一致反對，推舉代表十人向政府請願。當時，主管全省教育的機構不過是川軍總司令的政務處下面的教育科而已。那位科長姓馮。他接見我們時，首先把每位代表的姓名問清楚，記下來，然後才問我們的來意。不待我們講完話，他就先對我們斥責一番，再繼之以破口大罵。我們忍受不了，於是和他對吵起來。當然不歡而散。我們回到學校，聽說馮科長有電話來，說我和陳位仕（後改名陳志明西昌人、曾任監察院監察委員，正直無私，甚受各方愛戴）與王道純（都是第六班的）三個人「出言不遜、侮辱長官」，要學校開除我們三個人。我們一怒之下，不待學校掛牌開除我們，我們就貿貿然捲起被蓋，茫茫然走出校門。（未完待續）